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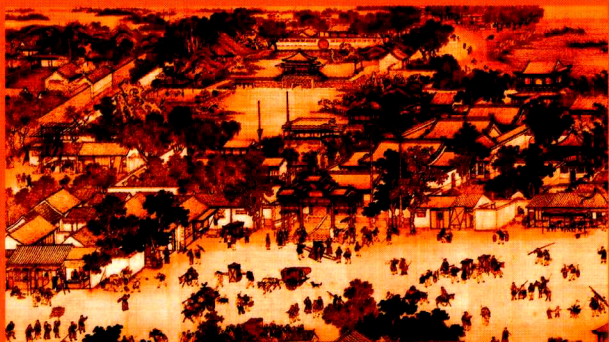


历史与现实

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启示录

林文勋 著

Lishi yu xian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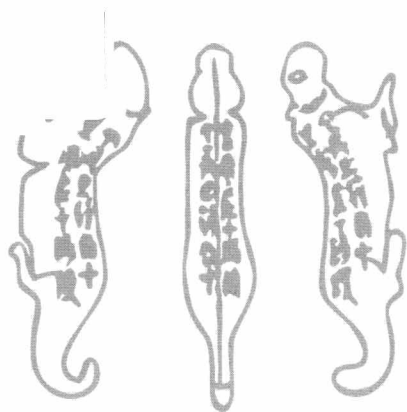
人民教育出版社

林文勋 著

历史与现实

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启示录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与现实：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启示录 / 林文勋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01-009391-8

I. ①历… II. ①林… III. ①社会变迁-中国-文集

IV. ①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3035 号

历史与现实：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启示录

LISHI YU XIANSHI: ZHONGGUO CHUANTONG SHEHUI BIANQIAN QISHI LU

作 者：林文勋

责任编辑：张秀平 胡喜云

封面设计：徐 晖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装订：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8.875

字 数：20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9391-8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本书的撰写既基于学理层面的思考,又基于现实层面的思考,总的目的是想探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如何从历史的长河中去找寻和书写历史的启示。

从学理层面来讲,主要是为了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再一个是“历史论文可不可以写现实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和历史文化学院工作时老师和同学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其实,这是两个老问题。但时至今日,更觉有探讨的必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先是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重视有加乃至“无限拔高”,后又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冷遇(或称“史学危机”)。经历了这一正一反的两个阶段,历史学正步入科学、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对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发展作出进一步的思考。一个极其明白的事实是,我们永远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新的历史,历史永远是现实的出发点,而现实也永远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人类不可避免地要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思想和智慧。尽管历史发展有着惊人

的相似之处,但历史学对人类的重要作用并不止于记述或“再现”具体的事例和简单的过程,而是对这些事例、过程进行总结,从中获得经验、思想与智慧。所以,历史学到底有没有用、历史论文可不可以写现实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在研究中能否处理好时代性、思想性、启迪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愚见以为,要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具有启迪性,关键在于我们的研究要突出思想性,彰显时代性。不论是古代的问题,抑或现实的问题,乃至今后的问题,都是历史研究的范围。正如本书所论,我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完全可以探讨 21 世纪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问题,并把它作为一篇历史论文来书写。但不论我们研究什么,都要有一种历史的视野、历史的大势和思想体现于其中。相应地,历史启示应是我们研究内容的应有之义,是研究结果的自然表达,而不是我们研究中的某种点缀和生硬的归纳与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研究历史,并不仅是简单地去“再现”历史,而是去“发现”历史。

就现实层面而言,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面临着许许多多重大的问题。历史地来看,很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往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要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重视历史,我们很难弄清其由来和症结。我们非常赞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长时段研究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研究视

角,同时还是一种对现实的关注。实际上,现实的发展一直都在对历史研究提出问题和要求。如果我们不去思考,仅仅停留于学理上的探讨,就会造成史学研究与现实的脱节。因此,历史研究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这也是其职责和使命所在。

基于上述两个层面的考虑,在我本人的研究中,思考和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历史启示就成了重要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历史时期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历史时期的“三农”问题,以及云南的对外开放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与现实的联系,并争取汇编一本历史启示录。现将初步的探讨成果汇编成册,书名定为《历史与现实: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启示录》,目的在于引起更多的人对历史研究的现代价值给予关注和思考。

本书共收论文11篇,按类编排。第一类包括2篇论文,集中阐释我对历史时期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和中国传统社会变革问题的看法。《历史时期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形成及其原因》一文系根据1994年我申报的《历史时期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课题的提纲整理而成,并作为我指导的博士生研究该问题的参考材料,后因博士生放弃该研究题目,便修改成文发表于《思想战线》2001年第3期。《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一文主要根据我在云南大学的同名专题讲座整

理而成。当时举办该讲座,主要是由于同学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的社会变革较为茫然,意在回答他们提出的困惑与问题,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当前纷繁复杂而又瞬息多变的社会,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后经修改发表于《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

第二类包括5篇论文,主要是基于我本人提出的“富民”阶层和“富民社会”理论体系,从历史时期的“三农”问题来思考当前的“三农”工作。我对历史时期“三农”问题的研究始于1999年,起初主要是围绕唐宋以来的“富民”阶层和“富民社会”做了大量实证性的研究,近年则将其与当前的“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贯通历史与现实,研究乡村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治理。我主要的观点是:要解决乡村的问题,必须解决乡村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问题,要大力培植乡村社会内部的动力层和稳定层,而不仅仅靠外力来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精英·土地产权·乡村动力——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启示》一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该文集中阐述了乡村精英在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培植乡村精英: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则是在此文基础上撰写的一篇政策建议。《历史上的乡村借贷及其评价》、《中国古代的乡村控制及历史启示》、《中国古代的贫富分化及政府对策》为近两年内所撰,均未曾发表。

第三类包括3篇论文,主要是在重新解构云南古代和

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讨 21 世纪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和云南的对外开放。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边远、封闭、落后”是其基本特征,通过这 3 篇文章的论述,我们意在强调云南很早就是一个开放的地区,开放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如果说是封闭的话,那也只是大开放中的区域性小封闭。同时还将说明,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从更高的层面去思考和推进云南的对外开放。其中,《从历史发展看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系根据本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云南省举办的一次西部大开发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后经修改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再论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则是根据我在 2010 年 1 月“西南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后发表于《思想战线》2010 年第 4 期。《云南的对外开放:基于国家战略的思考》完成于 2008 年国庆节,后发表于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印的《周边要报》2008 年第 4 期。

附录收录了《从平面式、静止式研究到立体式、动态式研究》一文。这是《历史教学》编辑部对我的专访,发表于该刊 2006 年第 10 期。在这篇专访中,我较全面地谈到了我的研究经历和对以上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故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在这些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李晨阳教授、张锦鹏教授、瞿健文副教授、卢光盛博士和在读博士生田晓忠、黎志刚、

董雁伟帮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多篇论文是我们合作完成的。没有他们的工作，本书是难以完成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限于我本人的水平和能力，书中定存有许多不足，请大家给予批评指教！

目 录

前 言	(1)
历史时期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 形成及其原因	(1)
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22)
乡村精英·土地产权·乡村动力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启示	(50)
培植乡村精英: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	(82)
历史上的乡村借贷及其评价	(92)
中国古代的乡村控制及历史启示	(146)
中国古代的贫富分化及政府对策	(169)

从历史发展看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	(198)
再论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	(213)
云南的对外开放:基于国家战略的思考	(234)
附录:从平面式、静止式研究到立体式、动态式研究	
——林文勋教授访谈录	(248)

历史时期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 不平衡问题的形成及其原因

中国是一个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发展中大国,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构成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我们追溯这种不平衡的历史源头时,不难发现,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是到今天才骤然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济格局长期变动的结果。

应该说,中国最初的经济格局是西部发展程度高于东部。中华文明兴起于西部黄河流域就说明了这一点。从《禹贡·九州》到《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全国经济区,关中区域一直居发展领先地位,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反映。魏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发生历史性的转折,学术界多称之为“经济重心的南北转移”。其实,经济重心的南北转移也就是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的移动。由此而来,逐渐形成了东西部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的换位。明、清时期,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显然,今天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就

是历史时期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延续和发展。

在人类历史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问题。21 世纪,解决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党中央做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既是现实的需要,同时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源泉,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解决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我们

我们从历史的深层次回答现实所提出的许多问题。

一

大量考古发现表明,我国原始文化和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域极为广泛,可以肯定,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或者说是多中心的。这些原始文明各具特点,相互有别,但还谈不上是不同的经济区。因为那时的经济特别是原始农业的发展水平还极其低下。

到大禹时代,“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¹据成书于战国时的《尚书·禹贡》追述,当时对九州田地和赋税分别作了等级划分。冀州,田地第五等,赋税第一等,错杂有第二等;兖州,田地第六等,赋税第九等;青州,田地第三等,赋税第四等;徐州,田地第二等,赋税第五等;扬州,田地第九等,赋税第七等,错杂有第六等;荊州,田地第八等,赋

税第三等;豫州,田地第四等,赋税第二等,错杂有第一等;梁州,田地第七等,赋税第八等,错杂有第七等和第九等;雍州,田地第一等,赋税第六等。这种划分具有经济区划的性质和特点,所以,“禹别九州”应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区划分。从所评定的田地和赋税等级来看,土地肥沃之区主要为西北和北方地区,南方的荆扬最下。

在上古时代,土地的肥沃程度决定了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夏商两朝凭借“三河”地带黄河冲积平原富饶的土壤建立起统治华夏大地的王朝。继起的西周,依托新兴的关中平原,从一个西部小邦逐渐发展起来,一举戡灭处于土壤肥力正在不断耗竭之区的商王朝,成为上古第三代王朝。虽然夏商周三代王朝兴起所依赖的中心经济区各有不同,但都局限于西北区域。这说明,那时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是西部高于东部的。不过,这还不是西部经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进入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应用,以及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修,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经济的大发展使全国的经济区更为明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并备述各经济区的自然资源情况、内部经济发展状况与特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从司马迁的描述来看,当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无疑就是处于陕西经济大区中的关中经济区。关中经济区

的地域范围，“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² 这个经济区，随着郑国渠、白渠等一批水利工程的兴修，富冠海内。司马迁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³ 公元前 338 年，苏秦对秦惠王讲到：秦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⁴ 这里所说的“天府”，就是指关中平原。事隔 100 多年后，公元前 202 年，刘邦战胜项羽，讨论定都问题，刘敬建议定都关中，其理由便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也”。⁵ 张良也向刘邦建议：“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⁶ 关中经济区因为富饶在当时长期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关中经济区之南是巴蜀经济区。这个经济区，司马迁仅在叙述关中经济区时附带提及。事实上，这是一个与关中经济区同样重要的独立经济区。这个经济区长期因岷江的泛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到公元前 3 世纪中后期，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平原得灌溉之利，于是蜀中“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⁷ 巴蜀经济区成为当时全国又一个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经济区域。

从地图上看，关中和巴蜀经济区均位于我国的西部。

与这两个经济区遥相对应的是东部的江南经济区,当时统称为“楚越之地”。这个经济区中,虽然西楚、东楚、南楚稍有区别,但总起来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砮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⁸由此可见,地处我国东部的江南经济区,火耕水耨,生产方式极为落后,人口稀少,商业几乎没有发展,经济生活处于依靠自然资源度日的状态,为全国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区域。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是在数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和巴蜀这两个经济区就已有了十分密切的经济联系,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较强。司马迁在《史记》中备述关中经济区后,紧接着说:

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楚,楚童。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穀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⁹

不言而喻,对于“地小人众”的关中经济区而言,它的

财富在全国“什居其六”，除了自身“沃野千里”这个条件外，南有巴蜀、西有关中、北有戎翟之利，西部经济出现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发展应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关中和巴蜀并称“天府之国”，在我国西部呈南北纵向垂直分布，与东部的江南经济区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两颗耀眼的璀璨明珠。这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

秦汉时期，西部继续保有它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

关中经济区 西汉武帝时，准备在关中扩建上林苑，东方朔劝阻道：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粟、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¹⁰